

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来自 CGSS(2010、2013) 数据的经验证据

卢燕平 杨 爽

(西南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 重庆 401120)

摘要: 本文基于 CGSS(2010 年和 2013 年) 数据, 实证研究了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对我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 (1) 居民的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显著影响了居民的幸福感受, 即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每上升 1 个百分点, 居民的幸福感受指数将上升 3.1%; (2) 与城镇居民相比, 农村居民的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对幸福感受的影响更大。与女性相比, 男性的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对幸福感受的影响更大; (3) 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对农村居民的影响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

关键词: 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 社会地位流动渠道; 主观幸福感受

中图分类号: F04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6049(2016)05-0089-08

一、引言

经济增长和政府政策的最终目标是提高国民的整体福利水平, 主观幸福感受是度量国民福利水平高低理想指标。^[1]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 经济的飞速发展却并未带来国民幸福感受的持续增加。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03 年至 2013 年间六次的调查数据显示, 自 2007 年起, 我国居民人均收入得到大幅提高, 平均幸福感受的增幅却很小甚至没有变化(如图 1)。

在中国, “幸福悖论”似乎已经出现, 国民的幸福感受随着经济增长开始呈停滞甚至下降的趋势。我国逐步显现的“幸福悖论”现象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关注, 研究幸福感受影响因素的文章出现井喷式增长。然而, 在既有研究幸福感受影响因子的文献中, 学者们似乎忽视了社会地位流动性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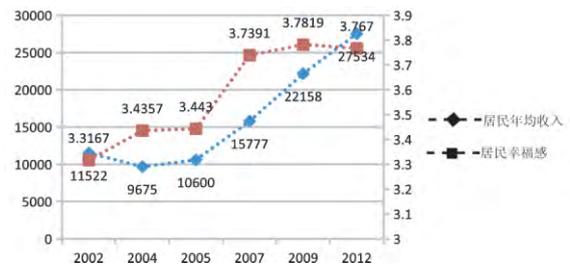


图 1 2002—2012 年度居民年均收入和幸福感受
数据来源: CGSS2003—2013 调查数据

期的重要性。早在 1973 年, Hirschman 在其提出的“隧道效应”^①中, 就强调了预期的重要作用。同时, 亚当·斯密也提出, 人们渴望幸福, 并不仅仅满足于物质所得, 而且还希望得到因社会地位上升带来的满足感(或者说是虚荣心)^[2]。由此可见, 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势必会对人们的主观

收稿日期: 2016-09-22

作者简介: 卢燕平(1975—), 女, 湖北人, 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经济发展、金融发展等; 杨爽(1993—), 女, 贵州人,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经济发展、金融发展等。

①Hirschman 举例说, 假设我行驶在两车道中, 遇到了交通堵塞, 此时左右两边的车都不能动了。当我发现右边车道的车辆向前移动时, 尽管我自己所处的车道还处于拥堵状态, 但我仍然会非常兴奋, 因为产生了摆脱拥堵的乐观预期。

幸福感产生相应的影响。那么其对幸福感究竟具有怎样的影响呢?现有文献尚未对此作出充足的研究,只有一部分学者对其作了初步分析。赵新宇等人的研究发现,预期对公众主观幸福感有正面促进作用。^[3]李磊、刘斌通过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职位升迁的未来预期对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4]但以上学者的研究结论要么缺乏代表性,要么缺乏研究深度。在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全面了解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显得尤为迫切。因此,基于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的重要性以及为了填补相关研究的空白,本文采用CGSS(2010、2013)数据,使用OLS方法,实证研究了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对幸福感的影响。

二、文献述评

通常,影响幸福感的因素被划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5]外部因素一般包含经济状况、生活事件等,内部因素主要涉及个体的内部建构。^[6]梳理前人的研究发现,外部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成果斐然,而学者们却忽视了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预期研究作为当代显学,其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譬如宏观经济理论中理性预期理论的问世、证券理论中期权理论的备受肯定、社会学领域中预期指数调查等都体现了预期研究的白热化。^[7]

本文梳理了有关预期研究的文献和理论,发现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可能通过以下两个机制对居民幸福感产生影响:

第一,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可能通过影响人们对社会体制的态度,进而影响幸福感。Martin Kreidl认为,人们对社会地位的主观认知和判断比客观的社会地位更能影响人们对社会公平的态度。^[8]显然,对社会公平持乐观态度的人将比持消极态度的人具有更高的幸福感水平。徐建斌、刘华研究发现,具有向下流动性预期的居民更偏好于再分配,^[9]而再分配对居民的福利水平具有重要影响。他们还指出,如果青年预期社会地位将会下降,他们就会对现行的社会体制产生不满的情绪。Xiaogang Wu提出,向上流动性预期加强了人们对当下社会体制的拥护,维护了社会稳定。^[10]社会稳定无疑是人们幸福的重要

保障。

第二,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可能通过影响人们的情感状态,进而影响居民幸福感。欧阳英认为,预期是人们对未来状况的判断,人们以此确定自己的行为决策。^[7]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预期与目标具有相同的含义。主观幸福感中的目标理论认为,目标能够被视为个体情感的关键参考,因为实现目标的过程和目标实现与否可以影响个体的情感状态。^[11]这样一来,预期即如目标,会对人的情感产生影响,从而会影响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体地说,未来预期来自社会成员对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双重认知与评价,消极预期会降低人们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进而导致居民幸福感缺失。同时,人们对未来生活状况的预期对当下的情感状态有重大影响,人们会根据当前的生活预期将来的生活图景,积极的预期会提高当下的幸福感;反之,消极的预期有损幸福感的提升。^[4]

迄今为止,实证研究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对幸福感影响的文献还较为缺乏。目前,国内仅有少量学者对此提供了实证经验证据,他们得出的结论几乎一致:预期能显著增进幸福感。李磊、刘斌将居民对未来的预期划分为收入状况的未来预期、资产的未来预期、职位升迁的未来预期和工作条件的未来预期,他们使用2006年CGSS数据实证研究了预期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得出结论,四类预期对幸福感都有显著的影响,其中,职位升迁的未来预期对男性的影响显著大于女性。^[4]但其研究只涉及城镇居民,并未对农村居民的情况进行研究。赵新宇等人弥补了李磊、刘斌研究的缺陷,他们采用2013年1月中国问卷调查的全国省级截面数据进行研究,其研究结论更具代表性。他们研究发现,收入预期对公众主观幸福感有显著促进作用。^[3]王嘉顺结合了社会比较理论和期望理论,以社会比较为主,采用CGSS(2005)数据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他得出,高自我期望^①和结果超过目标的自我比较可以提高主观幸福感水平。^[11]但是在王嘉顺的研究中,自我期望只是暗含在个人对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感受中的,个

^①王嘉顺(2012)在《社会比较、自我期望与主观幸福感:基于CGSS的实证分析》中,将“自我期望”定义为:社会个体在对其自身有意义的方面给自己设定目标并努力将其实现的过程。

人自我期望究竟对幸福感具有怎样的影响,王嘉顺并未对其进行充分的研究。国内学者欧阳英基于预期的动态性,分析了预期追寻与社会进步的关系,她指出,高质量的预期可以促进社会进步。^[7]遗憾的是,她并没有分析预期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但她的研究成果却使我们认识到积极向上的预期有助于社会进步,那么在社会进步的作用下,人们的幸福感水平也会得到提升。

国外直接研究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对幸福感影响的文献屈指可数。Alesina 等将欧美收入不平等对主观幸福感的不同影响归结为流动性感知的差异。^[12] Milanovic 深入探索了流动性的作用,他发现,在社会转型时期,公众可以极大程度地容忍收入不平等,因为他们认为,收入不平等为其提供了快速摆脱落后和贫困、实现收入迅速增长的条件,这其中,流动的作用不容忽视。^[13]

幸福是多维度的,它涵盖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14]为了全面了解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基于 CGSS(2010年、2013年)数据,实证考察了我国居民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对幸福感的影响,以期探究出其对幸福感的微观作用机制,并对相关政策制定提供有益参考。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本文可能是国内首篇研究发现对于农村居民而言,社会流动性预期与幸福感间的关系呈显著倒“U”型的文章,为我国社会福利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意见。

三、模型构建与变量描述

(一) 模型构建

根据已有的研究可知,绝对收入与居民幸福感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因此,本文在回归分析中纳入了绝对收入的平方项,以控制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作用,并且为了研究的方便,对绝对收入作对数化处理。根据期望值理论,期望值^①和实际奋斗结果间的差异可能与人们幸福感相关。有学者发现,如果较高的期望值与个体奋斗结果的差距过大,个体会因此产生消极情绪。鉴于此,为了探究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对幸福感的作用是否存在非线性效应,将社会地位流动性预

期的平方项纳入了回归分析中。本文借鉴赵新宇等人^[3]的研究方法,最终建立如下幸福方程:

$$H_{ij} = \alpha_0 + \alpha_1 E_{ij} + \alpha_2 E_{ij}^2 + \alpha_4 \ln I_{ij}^2 + \Gamma M_{ij} + \varepsilon_{ij} \quad (1)$$

在(1)式中, i 表示第*i*个被调查对象, j 表示省份, H 是衡量居民幸福感水平的指标(happiness), E 是居民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expectation), $\ln I$ 是绝对收入的自然对数, M 是控制变量矩阵, α 是各变量的系数, Γ 是控制变量的系数矩阵, ε 是随机扰动项。

(二) 变量说明

幸福是人们生活追求的最终目标,主观幸福感是度量国民福利水平状况的理想指标。^[1]本文借鉴陈刚、李树(2013)^[15]对幸福感(happiness)的量化方法,选取被调查者对CGSS2010和2013年调查时的问题“总的来说,您认为您的生活是否幸福”的回答来衡量幸福感。被调查者在选项“很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居于幸福与不幸福之间”、“比较幸福”、“完全幸福”间进行选择。这种测度方法具备充分的效度(validity)和信度(liability),^[16]并且具有心理测量学的充分性。幸福感的调查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居民主观幸福感调查结果统计分布

| 幸福分值 | 全样本 | |
|------|-------|-------|
| | 样本数 | 比例(%) |
| 1 | 161 | 1.28 |
| 2 | 742 | 5.92 |
| 3 | 2184 | 17.43 |
| 4 | 7498 | 59.83 |
| 5 | 1948 | 15.54 |
| 合计 | 11061 | 100 |

表1中的居民的主观幸福感:1表示很不幸福,2表示比较不幸福,3表示居于幸福与不幸福之间,4表示比较幸福,5表示完全幸福。

其次,是核心解释变量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expect)的度量。本文借鉴李磊、刘斌的研究方法,将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操作化为被调查者对调查问卷中“您认为您目前在哪个等级上”和

^①王嘉顺(2012):期望值,即个体判断自己达到某个既定目标以及这一目标满足某种需求的可能性,它其实是一种或然性,即是一种概率。

“您认为您 10 年后将在哪个等级上”两个问题回答的差值。CGSS 问卷将社会阶层划分为 10 层,“10”分表示最顶层,“1”分表示最底层。被调查者依据自己的认知对其当前所处和未来 10 年所处的社会阶层进行回答。

最后,是控制变量。控制变量主要包括绝对收入、相对收入、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健康状况、户籍和婚姻状况。其中,绝对收入(income)采用调查对象前年全年总收入来衡量;相对收入(relativity)采用被调查者对问卷中“您家的家庭经济状况在当地属于哪一档”的回答来衡量,选项“远低于平均水平”、“低于平均水平”、“平均水平”、“高于平均水平”、“远高于平均水平”依次被赋值为 1-5 的整数。表 2 汇报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 变量名 | 全样本 | |
|-----------------------|-------|-------|
| | 平均值 | 标准差 |
| happiness | 3.82 | 0.81 |
| expect | 2.50 | 1.82 |
| relativity | 2.76 | 0.69 |
| income | 9.96 | 0.75 |
| income ² | 99.79 | 15.39 |
| male | 0.58 | 0.49 |
| age | 46.56 | 14.85 |
| age ² /100 | 23.89 | 14.83 |
| commie | 0.15 | 0.36 |
| health | 3.84 | 1.00 |
| (urban_hukou) | 0.57 | 0.50 |
| married | 0.83 | 0.38 |

注:性别(male),男性赋值 1,女性赋值 0;年龄(age)为被调查者在调查当年的年龄;政治面貌(commie),中共党员赋值 1,非中共党员赋值 0;户籍(urban_hukou),城镇户口赋值 1,农村户口赋值 0;婚姻状况(married),有配偶赋值为 1,离异(包括丧偶)赋值为 0;健康状况(health)依据被调查者对调查设计的问题,“您认为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是?”的回答来衡量。问卷设计五个选项,“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很健康”并依次赋值 1 到 5 的整数。

(三)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全部来自 2010 年、2013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始于 2003 年,该调查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发起的遍及全国的大型社会抽样调查。根据本文的研究需要,将调查对象限定为 19 到 65 岁,在删除数据缺失的样本后,最终得到有效样本共 11061 个。

四、实证分析

(一) “OLS + 稳健标准差”全样本估计

首先,为了克服截面数据存在的异方差导致的估计偏误问题,本文采用“OLS + 稳健标准差”的方法进行回归分析。其中,加入了时间趋势控制变量,以控制时间趋势效应,同时,回归分析中控制了地区变量。

表 3 汇报了 OLS + 稳健标准差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提高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能够显著增加中国居民的幸福感知。当不考察个体特征控制变量时,变量 expect 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1)列),当纳入其他控制变量后,变量 expect 的估计系数同样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2)列)。具体地说,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每上升一个标准差(1.82),样本的主观幸福感的平均值将会因此上升 0.056 左右。正如前文所阐述的那样,提高社会流动性预期之所以能够显著增加居民幸福感知,理论上的可能渠道包括:首先,提高居民的社会流动性预期可以促使居民对社会公平持有乐观态度,而秉持乐观态度的人人会享有更高的幸福感知;社会流动性预期的提升反映了居民对社会体制持满意态度,保障了社会稳定,维护了居民的幸福感知。其次,积极的社会流动性预期给人们带来了正面的情感效应,积极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给予了居民较强的幸福感知。

为了检验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对幸福感知是否具有非线性的影响,(2)列中纳入了 expect²变量。在控制了个体特征变量后,其估计系数为负,但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在全样本中,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对居民幸福感知的影响仅具有线性特征,即居民的幸福感知水平是随着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的上升单调递增的。这可能的原因是,现阶段,大部分人对自身的预期都是建立在对自身及环境的正确认知上的,在追求预期实现的过程中,没有出现预期与现实结果的鸿沟。因此,向期望值接近的过程,即最大程度地增加其实现的可能性,使人们高层次的需求最大程度地得到满足对主观幸福感知尤其重要。而这可能得以实现的途径是加大力度完善社会地位流动渠道,增加晋升机会,使每个人都有机会顺利实现自己的梦想。

当然,本研究还汇报了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式(2)的结果表明,相对收入和绝对收入

的估计系数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绝对收入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呈倒“U”型关系, 这与张学志和才国伟 2011 年^[16]的研究一致; male 的估计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居民年龄(age) 与幸福感间呈“U”型关系; 政治身份(commie) 和居民自评的健康状况(health) 都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 户籍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 这可能的原因是, 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城市病”, 诸如城市人口膨胀、交通拥挤、城市贫困等问题,^[17] 导致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拥有更低的幸福感水平; 有配偶的比离异或丧偶的居民拥有更高的幸福感。综上所述, 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均符合理论预期。

表 3 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 变量 | (1) | (2) |
|-------------|-------------------|--------------------|
| expect | 0.052 *** (0.007) | 0.031 *** (0.011) |
| expect^2 | | -0.003 (0.002) |
| relativity | | 0.253 *** (0.012) |
| lnincome | | 0.423 *** (0.152) |
| lnincome^2 | | -0.019 *** (0.007) |
| male | | -0.091 *** (0.014) |
| age | | -0.031 *** (0.003) |
| age^2/100 | | 0.037 *** (0.003) |
| commie | | 0.098 *** (0.020) |
| health | | 0.152 *** (0.010) |
| urban_hukou | | -0.033* (0.017) |
| married | | 0.299 *** (0.022) |
| t | YES | YES |
| 地区变量 | YES | YES |
| F 统计量 | 34.65 | 112.26 |
| R^2 | 0.008 | 0.136 |
| Obs | 11061 | 11061 |

注表 3-5: ***、**、*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 括号中的数值是稳健标准误; 本表省略了常数项估计结果。

(二) 全样本 OP 估计及边际效果

表 4 社会流动性预期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OP 估计及边际效果

| 变量 | 估计系数 | 边际效果 | | | | |
|------------|----------------------|-----------------------|-----------------------|-----------------------|----------------------|----------------------|
| | | 1 | 2 | 3 | 4 | 5 |
| | (1) | (2) | (3) | (4) | (5) | (6) |
| expect | 0.033 *** (0.011) | -0.001 *** (0.000) | -0.003 *** (0.001) | -0.006 *** (0.002) | 0.003 *** (0.001) | 0.007 *** (0.002) |
| relativity | 0.358 *** (0.017) | -0.007 *** (0.001) | -0.033 *** (0.002) | -0.069 *** (0.004) | 0.031 *** (0.002) | 0.078 *** (0.004) |
| lnincome | 0.468 ** (0.223) | -0.009 ** (0.004) | -0.043 ** (0.021) | -0.090 ** (0.043) | 0.040 ** (0.019) | 0.102 ** (0.048) |

为了进一步解释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接下来, 本文采用有序概率(ordered probit, OP) 模型, 对模型重新进行估计, 并计算了每个解释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边际概率影响, 即边际效果。需要交代的是, 为了克服异方差问题, OP 回归中依然采用稳健回归。

表 4 汇报了估计结果。结果显示, 变量 expect 的估计系数仍然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进一步验证了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显著促进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同时, 边际效果的估计结果说明, 如果样本对象的 expect 水平每上升一个标准差(1.82), 将使得居民感到“很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居于幸福与不幸福之间”的概率分别下降 0.11%、0.55%、1.09%, 而使居民感到“比较幸福”、“完全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 0.55%、1.27%。

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均与 OLS + 稳健标准差估计的一致, 所以也验证了前文的实证结果是稳健的, 但边际效果的估计给出了更多有意义的信息。相对收入显著促进了居民幸福感水平, 且相对收入每上升一个标准差(0.68) 将使得居民感到“很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居于幸福与不幸福之间”的概率分别下降 0.48%、2.24%、4.69%, 而使居民感到“比较幸福”、“完全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 2.11%、5.30%; 绝对收入在达到倒“U”的极值点前, 绝对收入每上升一个标准差(0.75), 居民感到“很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居于幸福与不幸福之间”的概率将分别下降 0.68%、3.22%、6.75%, 而使居民感到“比较幸福”、“完全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 3.00%、7.65%; 其他变量对幸福感的边际概率影响的阐释与此相似, 此处不再赘述。

| | | | | | | |
|-----------------------|-----------------------|-----------------------|-----------------------|-----------------------|-----------------------|-----------------------|
| lnincome ² | -0.021 *** (0.011) | 0.000* (0.000) | 0.002* (0.001) | 0.004* (0.002) | -0.002* (0.001) | -0.005* (0.002) |
| male | -0.136 *** (0.021) | 0.003 *** (0.000) | 0.012 *** (0.002) | 0.026 *** (0.004) | -0.011 *** (0.002) | -0.030 *** (0.005) |
| age | -0.045 *** (0.004) | 0.001 *** (0.000) | 0.004 *** (0.000) | 0.009 *** (0.001) | -0.004 *** (0.000) | -0.010 *** (0.001) |
| age ² /100 | 0.055 *** (0.004) | -0.001 *** (0.000) | -0.005 *** (0.000) | -0.011 *** (0.001) | 0.005 *** (0.000) | 0.012 *** (0.001) |
| commie | 0.166 *** (0.030) | -0.003 *** (0.000) | -0.014 *** (0.002) | -0.031 *** (0.006) | 0.010 *** (0.001) | 0.039 *** (0.007) |
| health | 0.218 *** (0.013) | -0.004 *** (0.000) | -0.020 *** (0.001) | -0.042 *** (0.003) | 0.019 *** (0.002) | 0.047 *** (0.003) |
| urban_hukou | -0.045* (0.025) | 0.001* (0.000) | 0.004* (0.002) | 0.009* (0.005) | -0.004* (0.002) | -0.010* (0.006) |
| married | 0.411 *** (0.030) | -0.011 *** (0.001) | -0.046 *** (0.004) | -0.079 *** (0.006) | 0.059 *** (0.006) | 0.077 *** (0.005) |
| t | YES | | | | | |
| 地区变量 | YES | | | | | |
| Pseudo R ² | 0.062 | | | | | |
| Wald chi2(13) | 1526.19 | | | | | |
| Obs | 11061 | | | | | |

(二) 分群样本估计

以上的实证分析已初步证实,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显著促进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但在中国,与“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相伴而生的城乡户籍分割制度导致城市和农村两部门之间存在较大的经济发展差距。城乡差距仍在扩大,关系持续不顺,^[18]并且,在该差距之下,城市和农村居民在职业流动的过程当中,社会资本效用也存在很大的差距。^[19]另外,中国从封建社会一直发展到今天,“女主内”、“男主外”的思想渐渐改变,女性和男性在社会地位上的角逐日趋激烈。因此,为了探究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对不同群体的影响是否具有差异,本文采用如下两种策略对样本进行分群,然后采用“OLS+稳健标准差”估计了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对各群体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果汇报在表5中。

首先,我们分别估计了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对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表5中第(1)、(2)列)。总的来说,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水平,但对城镇居民来说,影响并不显著。具体地说,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对城镇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对农村居民

幸福感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即当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每上升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将因此上升5.4%。预期对城乡居民幸福感影响存在差异的可能原因是,城镇居民拥有优越的生活和居住条件,例如在城市,交通便利、医疗保障、娱乐设施丰富等都给城市居民带来了较高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感。而农村居民由于所处环境的落后,其对流入城市以及晋升发展的渴望较之城市居民而言更加热烈,他们更希望能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值得注意的是,在农村群体样本中,expect²的估计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对于农村居民而言,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对幸福感的影响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即其关系呈倒“U”型特征;而在城镇群体样本中,expect²的估计系数为负,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对于城镇居民未出现这样的趋势,可能的原因是,城乡居民的社会流动模型存在很大的差异,农村居民在流动的过程中遭遇的“就业歧视”以及“婚姻歧视”都使得他们的仕途面临种种有形或无形的“墙”。根据前述提到的期望值理论,期望值和实际努力结果之间的差距很可能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相关,如果个体努力的结果与高期

望值间的差距过大,会导致个体产生消极情绪,从而损害了幸福感的提升。因此,当农村居民的预期水平达到一定高度而不能得以顺利实现时,幸福感呈现下降趋势。这一研究发现意味着,拓展农村居民向上流动的渠道可能是当前最有效率的增加农村居民幸福感的策略,而这得以实现的具体途径可能是推进医疗体系改革等。同时,增强农村居民的社会流动性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

接下来,本文估计了男、女两个子样本。结果显示,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对男性居民幸福感

的影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对女性居民幸福感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的原因在于,在当前的社会系统中,男性和女性从事不同的社会分工,虽然性别角色在很多方面正在发生转变,但依然存在如男性属于工作等公共领域,女性属于相夫教子这样的认识。社会注重男性主体地位的性别角色观念以及强大的道德、伦理、风俗教化和一些针对女性的社会排斥政策制度,使得男性重事业、女性重家庭的价值取向根深蒂固,甚至导致了男高女低的成就动机。

表5 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分群样本估计

| 变量 | 城市(1) | 农村(2) | 女性(3) | 男性(4) |
|-----------------------|-------------------|-------------------|-------------------|-------------------------|
| expect | 0.022(0.014) | 0.054*** (0.021) | 0.022(0.017) | 0.037** (0.015) |
| expect ² | -0.000(0.003) | -0.007* (0.004) | -0.000(0.003) | -0.005(0.003) |
| relativity | 0.246*** (0.016) | 0.259*** (0.018) | 0.249*** (0.019) | 0.257*** (0.016) |
| lnincome | 0.818(0.211) | 0.178(0.259) | 0.521** (0.258) | 0.424** (0.192) |
| lnincome ² | -0.037*** (0.010) | -0.008(0.013) | -0.026** (0.013) | -0.019** (0.009) |
| male | -0.118*** (0.018) | -0.064*** (0.023) | | |
| age | -0.036*** (0.004) | -0.031*** (0.005) | -0.039*** (0.004) | -0.026*** (0.004) |
| age ² /100 | 0.040*** (0.004) | 0.040*** (0.006) | 0.046*** (0.005) | 0.031*** (0.004) |
| commie | 0.109*** (0.023) | 0.070* (0.042) | 0.092** (0.036) | 0.105** (0.024) (0.028) |
| health | 0.153*** (0.012) | 0.150*** (0.016) | 0.147*** (0.015) | 0.155*** (0.013) |
| urban_hukou | | | -0.007(0.028) | -0.053*** (0.022) |
| married | 0.305*** (0.026) | 0.309*** (0.040) | 0.321*** (0.033) | 0.290*** (0.030) |
| t | YES | YES | YES | YES |
| 地区变量 | YES | YES | YES | YES |
| F统计量 | 79.60 | 43.60 | 48.93 | 72.34 |
| R ² | 0.154 | 0.120 | 0.134 | 0.139 |
| Obs | 5894 | 5167 | 4630 | 6431 |

五、结束语

在当下,人们的追求不仅仅停留物质层面,更多地上升到了社会地位层面。探究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进而思考如何切实保障居民的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得以顺利实现,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受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本文基于CGSS(2010、2013)数据实证分析得出,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对居民的幸福感受水平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在进行分群样本分析后得出,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对农村居民的影响显著高于城镇居民;与女性相比,男性的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对幸福感影响更大;农村居民的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与幸福感水平间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显然,这一结论为我国社会流动渠道的制度建设提供了参考。

本文的研究说明,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可能是中国居民幸福感的来源之一,其对居民幸福感受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因此建设和谐社会、增加居民幸福感受,要求政府和各单位加大力度建立健全社会地位流动渠道,这将有助于提升居民的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进而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受。其次,拓展农村居民晋升的途径、增加农村居民的发展机会、提高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受,需要完善的医疗体系以及社会保障制度,使农村居民拥有和城镇居民同等的医疗保障服务,这将可能有效地提升农村居民的社会流动性,进而提升幸福感受。上述措施不仅能够提高居民的整体幸福感受,而且还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的幸福感受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

参考文献:

- [1] Frey Stutzer. What Can Economists Learn from Happiness Research?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2 40(2) : 402-435.
- [2]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M]. Liberty Press, 1979: 50-54.
- [3] 赵新宇, 范欣, 姜扬. 收入、预期与公众主观幸福感 [J]. 经济学家, 2013(9) : 15-23.
- [4] 李磊, 刘斌. 预期对我国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J]. 南开经济研究, 2012(4) : 53-67.
- [5] Diener E. Subjective Well-Being [J]. Psychology and Bulletin, 1984 95(3) : 542-75.
- [6] 苗元江. 幸福感, 研究趋向与未来趋势 [J]. 社会科学, 2002(2) : 51-56.
- [7] 欧阳英. 预期追寻与社会进步关系的当代分析 [J]. 现代哲学, 2005(3) : 50-57.
- [8] Martin Kreidl. Perceptions of Poverty and Wealth in Western and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J].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2000(2) : 151-176.
- [9] 徐建斌, 刘华. 社会公平认知、流动性预期与居民再分配偏好——基于 CGSS 数据的实证研究 [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13(2) : 48-56.
- [10] Xiaogang Wu. Income Inequality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J]. The China Quarterly, 2009(200) : 1033-1052.
- [11] 王嘉顺. 社会比较、自我期望与主观幸福感: 基于 CGSS 的实证分析 [J].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3) : 65-72.
- [12] Alesina A, Di Tella R, MacCulloch R.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 Are Europeans and Americans Different?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4: 9-10.
- [13] Milanovic B, Ersado L. Reform and Inequality during the Transition: An Analysis Using Panel Household Survey Data, 1990-2005 [M]. SSRN Working dissertation, 2008: 84-108.
- [14] [葡]佩德罗·孔塞桑, 罗米娜·班德罗. 主观幸福感研究文献综述 [J]. 卢艳华, 译. 国外理论动态, 2013(7) : 10-23.
- [15] 陈刚, 李树. 管制、腐败与幸福, 来自 CGSS2006 的经验证据 [J]. 世界经济文汇, 2013(4) : 37-56.
- [16] 张学志, 才国伟. 收入、价值观与居民幸福感——来自广东成人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 [J]. 管理世界, 2011(9) : 63-73.
- [17] 陈哲, 刘学敏. “城市病”研究进展和评述 [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12(1) : 101-102.
- [18] 刘勇. 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历程、问题和趋势 [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1(3) : 23.
- [19] 黄晓波. 职业流动中, 社会资本效用的城乡差异 [J]. 中国统计, 2007(12) : 54-55.

(责任编辑: 黄明晴)

The Impact of Anticipation of Social Status Mobility on the Happiness of Resident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GSS(2010、2013)

LU Yanping¹, YANG Shuang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nfluence of anticipation of social mobility on the well-being of residents in China based on the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data in 2010 and 2013(CGSS2010 2013).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nticipation of social mobility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well-being of residents, when the anticipation of social mobility increases by 1%, the happiness index of residents rises by 3.1%. Secondly, compared with urban residents, the effect of the anticipation of social mobility on the well-being of rural residents is significantly greater. At the same time, compared to women, the impact of the anticipation of social mobility on the well-being of men is also much bigger. Finally, there is an inverted u 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nticipation of social mobility and the happiness of rural residents.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are useful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channel of social mobility and perfect the social welfare resources.

Key words: social status mobility expect; social mobility channel; subjective well-being